

## 文献综述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大背景下产生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受到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我国人口流动规模非常有限。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这种局面逐渐在发生改变,人口流动量逐年增大,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与此同时,我国也在经历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愈来愈大的人口流动,正是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2008年底,国务院新闻办发布官方数据:中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3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超过2000万。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农民工子女中失学率高达9.3%,近200万名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从发展趋势来看,进城务工人员的人数将会逐年递增,流动儿童的数量同样也不例外,而他们所面临的教育问题也将越发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进城农民工子女是城市的新移民,将来必定会成长为城市中的新一代公民。他们能否受到合格的教育,不仅关系到他们个人的发展、家庭的依托,更关系到城市的健康和社会的和谐,关切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有学者认为,进城农民工子女若不能受到合格的教育,他们耽误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还会成为社会未来的不稳定因素。该现象已被无数的实例证明。如何使进城农民工子女有学上、上好学,使他们成长为健康发展、对社会有贡献的新一代公民,急需政府、社会、家长各方高度重视并密切合作。

近十几年来,政府不断提升对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2001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要重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各流入地政府投入大量财政经费、开放公办学校免费接收符合入学条件的流动儿童,同时审批了一批打工子弟学校,并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尽管如此,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首先,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致使流入地政府面临许多考验。其次,城市公办学校教育资源短缺致使政府难以真正落实“两为主”政策。由于城市公立学校远比农村公立学校高昂的办学成本以及较大的教育质量

差距，免费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在看似符合教育公平的背后不仅给城市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必然引发教育移民问题，形成城市洼地效应。农民工子女持续、快速、无序增长，给流入地政府在教育管理、经费投入、校舍建设、师资配置等方面，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压力。因此各城市公立学校不得不设立各种门槛以限制流动儿童的入学。依赖公办学校完全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还找不到解决方案。最后，研究发现，公立学校教师愿意接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教师只是少数，流动儿童融入公立学校仍然困境重重。

打工子弟学校的大量存在也阻碍了“两为主”政策的实施为使农民工子女有学上，打工子弟学校在很长时间内仍有存在的必要性。流动儿童学校的出现是在中国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现行教育体制无法适应社会转型及变迁的结果，这类学校在过去及现在一段时间内解决了低收入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对现行教育体制起到“补充”及“自救”的功能。然而，我国的民办教育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我国的民办教育大多数是营利性的，营利是举办者的重要追求。营利性制约了政府的投入、也制约了社会捐赠，学费成为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办学经费来源的单一性注定了为低收入农民工子女开办的学校的办学经费严重不足，无法保证教育所需，甚至还有很大一部分学校存在较严重的安全隐患，得不到政府的审批。这类学校的大量存在，也说明了农民工子女入学选择非常少。

针对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解决的措施和办法，但是这些办法的实现现实中都存在着一定难度。例如：

- (1) 教育领域率先全面破除户籍壁垒,取消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
- (2) 实施电子学籍制度,实现对农民工子女学籍的动态管理;
- (3) 明确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拨付责任;
- (4) 加强流入地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将农民工子女教育纳入常规管理及考核指标之中;
- (5)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资助和参与办学,科学认识和改造打工子弟学校。

除了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城市社会融入的难题在这一群体中也异常凸显。流动儿童群体内部的整合较好，但流动儿童与其居住的社区之间的整合程度总体上来说并不十分理想。在整合的过程中，迁入时间对流动儿童与迁入地社会之间的整合程度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它存在一个“门槛”值---即流动儿童在京居住到了一定时间以后,整合的程度会相当高；但在这之前却会有所波动。流动儿童的整合还受到了其他因素，如表示自身特征的年龄、性别，表示家庭背景的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迁出与迁入地的生活背景，的影响。特别是流动儿童在迁出地的生活背景，如在老家上学的时间长度对于流动儿童在迁入地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结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对流动儿童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研究不仅应关心流动儿童现在的状况，而且应注意流动儿童的成长历程。

流动儿童城市融入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而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又反作用于其在城市的融合进程。影响流动儿童心理状况的重要因素来自于三个方面：个体的性格特征、学校的同伴关系，以及与父母亲间的交流情况。个体性格特征的开朗与否是基本的因素，在学校里的同伴关系则是环境因素，而亲子交流情况则是家庭背景与教育方式的问题。学校同伴关系可能随着个体特征而发生变化，而个体特征则可能会由于家庭教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从根本上来看，家庭的教养方式才是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教养方式与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无关。因此，不论是贫穷家庭的孩子，还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只要运用合适的教育方式，就能培养出心理健康的儿童。

农民进城务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环境、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对孩子的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有诸多的矛盾相伴而行，对家庭教育产生影响。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是试图以自身的劳动来改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然而由于他们自身素质的缺陷，不可避免地承担着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自身。作为“外来人口”，他们绝大多数由相对贫穷农村来到城市，整体文化素质低于城市人口，在城市工作经历短暂，加之身份、居所等客观因素，难以在短期内被城市人所接纳，更难从事高职业声望的工作，其生活水平、职业地位属于社会的下层或中下层。一些人不甘于现状，希望改变这一现状，他们必须拼命赚钱，也是为了孩子有一个好的未来做好铺垫；二是来自孩子。孩子来到城市后，比成年人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尤其是上学的孩子，知识丰富了，视野开阔了，接受了许多城市的新事物、新观念，他们的言谈、举止、穿戴、爱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城市化了。相对而言，文化程

度较低的父母却很难满足孩子在学习上、精神上的需求，一些孩子明白的事父母不懂了，长者权威逐渐削弱，亲子之间的沟通障碍以及代际差异越发突出。

也就是说，作为家庭中孩子的教育者，进城农民工一方面对孩子抱有相当大的希望，尽力为孩子做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另一方面，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深感力不从心，常常是束手无策。这是因为，尽管流动人对城市现代化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知识改变命运”的认同，已经在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和投入中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然而他们对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视程度却远远低于对孩子的关注，尤其是缺少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充电”。这就使得体现家庭教育特点的“潜移默化”、“言传身教”的积极作用大打折扣，也不可避免地在家庭教育观念和方式上产生偏颇，并成为孩子成长中的障碍。

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出生和成长经验已经与城市不可分离；他们缺乏农村的生活经验，更熟悉城市运作的法则；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不满足于只能糊口的工作，他们要求做体面的工作。种种现实均指向他们必然留在城市，成为城市的新市民。

但是流动儿童在城市的出路令人堪忧：义务教育后的升学问题，其中包括初中升高中存在制度障碍和不稳定的学习环境；就业问题，包括教育与技能缺失、身份限制影响他们的就业机会及缺乏就业服务与继续教育的机会等。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流动儿童在城市将来的命运仍然会徘徊在主流社会的边缘。

进城的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能否因为学校教育而改变其父母辈带给他们的边缘、弱势地位，真正融入城市，实现代际流动，是建构稳定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